



二战后期 美国马特霍恩计划研究

On the Operation Matterhorn in the Late World War II

胡越英 著

中華書局



二战后期 美国马特霍恩计划研究

On the Operation Matterhorn
in the Late World War II

胡越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战后期美国马特霍恩计划研究/胡越英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

ISBN 978-7-101-12348-7

I.二… II.胡… III.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美国
IV.①E712②K7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9202号

书 名 二战后期美国马特霍恩计划研究

著 者 胡越英

责任编辑 张荣国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7 $\frac{3}{4}$ 插页2 字数30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348-7

定 价 58.00元

序

本书是胡越英副研究员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

中国现代史上的四川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四川各级档案馆存有大量完整的抗战档案资料，这些资料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四川诸多历史研究者出于资料方面的考虑，做了不少“抗战时期四川……”的研究，本书作者是其中之一。

从2000年攻读硕士学位时起，作者就对二战时期四川航空史怀有浓厚兴趣，一直关注、搜索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四川省档案馆存有不少抗战时期机场建设的档案，在至少三十多次的机场“特种工程”档案中，胡越英关注到其中一次工程量颇大的机场建设，这就是1943—1944年为美国马特霍恩计划(Operation Matterhorn)修建机场的川西“B-29 特种工程”，并以此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

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作者试图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深入研究。作为导师，我认为这项研究必需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川西“B-29 特种工程”所支持的马特霍恩计划究竟是怎么回事？缘何实施？该计划在美国的总战略中占据何种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已非四川资料所能解决，若无美国方面的档案资料支撑，即便有些英文论著可供参考，也无法深入该选题的研究。

兴趣和意志真是学术研究中意想不到的巨大动力，对马特霍恩计划这段历史浓厚的兴趣支撑着作者心无旁骛地走上一条艰难的探索道路。在老师、同学和很多档案工作人员的热情热心支持下，作者收集到不少研究著作、历史当事人回忆录，和大量对本研究必不可少的档案资料——美国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和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博物馆(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的相关档案。资料情况的好转使之将研究重心从地方史上的“B-29 特种工程”，逐渐转移到了以马计划为对象的中美关系史上来，这个博士论文选题也才最终确定

下来。

在解决关于马计划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过程中，作者发现马计划研究中存在一个难以解释的根本“矛盾”：从传统军事意义上讲，马计划很“失败”，而且不少的历史当事人以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有此看法，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该计划却具有近乎异常的兴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象”呢？作者在硕士阶段曾认同此前国内外研究中的基本认识：马计划是一个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的行动，是“罗斯福出于政治上拉拢中国”而不计军事效果的举措。但这种说法并不足以解释该事件中诸多令美国学者亦感“怪异”的现象。尤其是马计划在人力、物力等方面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以及 B-29 作为原子弹弹载机这一系列的史实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在分析马计划优先性的种种表现时，论文试图根据马计划与曼哈顿计划之间密切的关系及相关史实，寻找马计划之所以获得顶级优先权的原因。作者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马计划可能是原子弹计划的某个重要环节。通过对该时期美国相关历史的多角度观察和论证，作者对这个阶段各项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作出如下的基本判断：

1. 代价高昂的马特霍恩计划，应是二战时期美国另一耗资巨大的“B-29 工程”(B-29 Project)不可或缺的“战地试飞行动”；
2. “B-29 工程”是美国远程战略轰炸、全球战略思想得以实施的必要载体和工具；
3. 耗资 30 亿美元的 B-29 工程同时也为原子弹计划提供投放武器，并因此获得在资金、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最高优先权。

二战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耗资 20 多亿美元，但为研制远程重型轰炸机的“B-29 工程”至少投入 30 亿美元，“B-29 工程”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可见一斑，B-29 重型轰炸机因此成为世界进入核时代的划时代科技成果。马计划作为“B-29 工程”的“战地试飞行动”，获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就不足为怪了，作者关于马计划和曼哈顿计划(间接的)从属关系的设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结论。

抗战期间与马计划相关的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等研究中，不少内容离散为不太关照的“点”。如“史迪威事件”、“驼峰航运”、“飞虎队”、“陈(纳德)史(迪威)之争”、“美军观察组”等等。各研究之间叙述虽有交叉，但由于

只以某一事件为研究对象,要涉及各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似乎就超出了研究范围。《中美关系史》等专题性的通史研究中,对上述诸多事件都有所涉及,不过并没有关注到其间的内在联系。当然,正是这一系列丰富的“点研究”使得本书的“面研究”成为可能。

作者试图将地方史与国际关系史贯穿起来对马计划进行专门研究,多方关注马计划在中国战场甚至美国太平洋战略中的特殊地位,揭示其获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之奥秘。而这正是研究得以深入的前提:如果马计划确实在中国战场具有最高优先权,那么马计划对二战时期发生在中国战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必将起着重要乃至主导的作用。所以,书中还论及“阿诺德重庆之行”、“华莱士使华”、“史迪威事件”、“陈纳德胜利前夕被撤”、“10亿美元贷款案”、“中美机场款交涉案”等与马计划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

如果作者对马计划的基本认识成立,本书或可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在研究该段历史事件时,马计划可作为串起这一历史时期诸多“离散事件”的红线。

不仅如此,我们还能通过该书豁然开朗地看到美国早期全球战略和核战略在中国的实施情况和对中国各方的影响。全球战略、核战略,这两种至今为美国所倚重的国家战略,虽然不被当时的中国所认识,但必然会对中国、国共两党、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等产生特定的影响——这一认识也就为二战史、抗战史研究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路径。

譬如关于世界核战略发展的研究中,大多以1945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投放后为研究的时间起点,似乎核战略的影响只是在原子弹信息公开以后才形成。^①然而,核武器作为影响现代世界格局划分的重要影响因素,在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就有一个不短的隐性发展过程。B-29远程轰炸机作为最早的原子弹投放工具,前期的研制、决策、发展、实验过

^①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关于美国核战略、冷战的研究时段多是从杜鲁门时期,也就是原子弹在日本投放后开始的。国内如萨本望的《美国核战略的演变及走向》(见《和平与发展》1998年第3期)便将美国的核战略分为三个阶段:1945—1960的初创阶段、1961—1988的成熟时期,以及1989到现在的大调整转折时期。国外的冷战研究中虽有 Andre Fontaine 的 *History Of The Cold War-From October Revolution To The Korean War* (Random House Inc, 1970) 将时段前推至俄国十月革命,但大多数研究的起始时段都如 Martin Walker 的 *The Cold War* (Wlsker & Watson Ltd, 1993) 那样,将 1945 年原子弹爆炸作为冷战和核时代研究的起点。

程,便是美国核战略和世界进入核时代的必然环节。

对于马计划期间美国对华政策主流和诸多事件的变换走向,作者始终将美军联合计划参谋部 JSP(Joint Staff Planners)所制定的《全球形势报告(1943—1944)》(*Global 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 1943-44*),作为一个最根本的“风标”,而不为某个前线美国官员的个人言论所困。

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这一事件,建立一个“函数”模型的话,也许美国(在华)总战略就是战时中美关系、马特霍恩计划等等“函数”的自变量;史迪威事件、陈纳德被撤、美军观察组以及所谓的“华北登陆计划”便是其中随自变量改变的因变量;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蒋介石国民党、延安中共、苏联等几方面的利益诉求算是其中的“常量”或“系数”。正是因为心中存在这样一个宏观“模型”,作者才能在几个变量同时变化的时候,发现、把握各个“变量”、“常量”间的关系,和整个“函数”的变换规律。

在叙述过程中,由于与马计划相关的事件较为繁杂,表述极易出现头绪混乱、条理不清的情况。为避免逻辑上的混乱,著作试图以一个核心问题(“非常失败”的马计划为何获得仅次于曼哈顿计划的优先权),以及作者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马计划是“B-29 工程”的战地试飞行动,“B-29 工程”又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弹载机)来贯穿全文,在繁杂的史料中理出相对清晰的逻辑条理。

沿着这样一个潜在的主线行文,作者有可能为引出心中的“答案”,而将一些“有利的证据”强加于某些可能不相干的事实上;也可能忽略一些自认为“不相干”的史实,从而干预本应“客观”的历史叙述。然而,历史研究本质上就是一种“阐释”,即便“纯粹”的叙事也无法回避叙事者个人的见解。想要完全抹去历史“构建”的痕迹,必然与哲学阐释学产生尖锐冲突,而哲学阐释学是当代世界公认的至理之一。

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主观性(艺术性)其实是两个并不矛盾的层面:客观性是历史本身,主观性则是关于历史的描述(即所谓史学)。故“客观性”是史家始终追寻的目标,主观性则是史学解释体系的指向。以具有主观特征的方法追求无限的“客观目标”,这就像函数的自变量趋向无穷值时,整个函数仍然能够得到一个确定的“极限”定值那样——尽管“客观性”是史学函数不断趋向的、不确定的“无穷大”,但史家还是能在这种趋势中,描述出一个确定的历史面貌,形成一种历史的“知识”。

行文时,是置身于当时的历史场景“客观”、“公正”地叙事,还是带着问题进行叙述?就本质而言,两种方式是不冲突的“归纳”与“演绎”关系。任何“客观”、“公正”的历史叙事实质上也是当代人按自己主观认定的“客观”、“公正”在解释,并从中发现史料的意义。

甚至可以说,一个史家如果越是强调自己叙事“客观”,他实际上就越“主观”。历史叙事只要依据史实,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就可能留下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知识。而任何不合事件内在逻辑的叙述方法,无论如何“注意按照事件本身的发生时间”,“按照其本来面目来清理”,其“客观性”实际上不存在,也缺乏意义。

此书主要叙述关于马计划的历史过程,尤其关照它与其他历史事件的关系和所产生的影响。在努力“还原”历史的叙述中,伴随着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对答案的追寻,我们无法因此而否认其“客观性”。所要注意的是其论证是否严密有据,是否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史学终非可以精确推演的数学模型,其中论述正确与否也有待日后研究的深入和完善,但本书的论证过程仍是颇具智慧,亦很见功夫的。当中诸多观点都为本论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经过十年的积累和近五年的打磨,这篇博士论文有幸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后期资助,这是对此项研究最好的鼓励和认可。希望作者继续保持洞见历史奥秘的浓厚兴趣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力争在这一领域创造出更多、更有创见性的学术成果。

陈廷湘

2015 年秋

引言

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美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B-29重型轰炸机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基地出发，以中国成都附近为前进机场(advanced air base)，对日本南部九州和在华日本占领地鞍山、台湾等军事要地实施远程战略轰炸，此即二战后期美国在华实施的“马特霍恩计划”。

马特霍恩计划在筹划之时，因经济成本高昂、政治代价巨大，且预计效果“不佳”，曾受到美国一些军方人士甚至部分国家高层决策者的反对，但以总统罗斯福为首的决策层在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上力排众议执意实施。

为实施马计划，除了印度机场的修建外，华盛顿还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首先是在川西修建四个重型轰炸机机场和几个战斗机机场，为在华美军提供相应的饮食起居服务。另一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又至关重要的配合是，为美方提供气象、敌方情报服务，这些情报的来源往往是多方面的。和此前就已进入中国收集中国气象等军事情报的美国“海军中国组”(Naval Group, China)一样，实施马计划的陆军二十航空队所需气象情报就有至少三种信息来源：“中国气象局”、“航空委员联合组织”、“中航公司”。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派驻中国西北的“美军观察组”(The U. S. Army Observe Group)。

美军派遣整整一个“观察组”到西北、华北地区，必将与中共交往，“观察组”驻扎延安，重庆方面的敏感和不满可以想见。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仍与蒋介石多次直接电文交涉，冒着影响中美关系的巨大政治风险，坚持向“非法武装政府”——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

美军“联络”中共，进入其控制地区的具体军事目标，在于建立气象观测站，获得马特霍恩计划实施部队——二十航空队所需要的轰炸目标——日本本土的气象预测信息。

对马计划来说，军事观察组在延安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支持其重要的

后勤工作——B-29 回程机组人员的搜救,恰当、及时地处理 B-29 轰炸机坠落的残骸。有时,“空一地搜救组织”的首要任务并非人员搜救,而是摧毁 B-29 残骸,其原因在于 B-29 作为当时世界航程最远的远程轰炸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及时摧毁 B-29 残骸,其实质是要严密防止日本以及未来潜在的“敌人”苏联获得任何有关 B-29 的技术情报,以保持美国在远程重型轰炸机这种全球战略武器上的领先性。

美军观察组的使命虽然在对日作战结束后已经改变,但最初组建观察组充分而必要的原因在于它对马计划的直接支持:延安美军观察组在对日战争期间,不仅为马计划和后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对日轰炸,甚至原子弹的最后投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气象情报;并使搜救网络覆盖了包括 B-29 在内的所有在华飞机可能到达的地方。

延安美军观察组和海军中国组同样来自美国,也同样要与中共接触,但重庆对两个观察组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由于梅尔斯带领的海军中国组是一个非正式的边缘化组织,在美国并不受重视,在军中也时常受到排挤。然而在中国,由于是通过“中美合作所”这个有“合法政府”参与的合作组织而与中共“间接”、“合法”地接触,海军中国组得到了重庆的重视与合作,曾名噪一时。

延安美军观察组要与中共发生“大范围正面深度交往”,却仅以服务 B-29 轰炸行动这种具体的军事理由而派出,因此,尽管它与国民党方面有最高级别的交涉也不足以消解重庆的极度不安。蒋介石唯恐美军与延安接触造成对中共边区“非法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马计划实施后,中国战场上的国共双方,以及驻华美军各派都有着形态各异的强烈反应。

国民党利用美方实施马计划的机会与对方讨价还价,寻求进一步的军事、经济支持,并艰难地维持着备受延安威胁的中央权威。因为在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也和气象情报的获取那样,美军的救援系统不仅覆盖了战机在国统区所有可能到达的海域、陆地、国民政府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还包括中共所在的西北、华北地区。

中共方面由于马计划的情报组织美军观察组驻扎延安,也不免受到很大影响。尽管和重庆一样对观察组的真实用意不甚明了,但中共确如蒋介石所担心的那样,随着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获得了一种被华盛顿“承认”的

快意。延安似乎感到美方不惜派出华莱士副总统促成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行，意在“架起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甚至开始在美、苏两大国际力量之间做细心的掂量。然而，华盛顿这种迟到的“承认”与“合作”随着一次次同美军“极为可行”的合作行动的流产，中共对美国满心的期待最终都变成了失望和被再度强化的自主发展意识。

就在国共双方小心计算美军带来的“机遇”与“风险”的时候，在华美军的两种军事力量代表——美陆军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以及美国参战之前就来到中国，因“飞虎队”而闻名的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首脑陈纳德，他们之间也在进行着“陆战取胜论”与“空战决定论”的较量，这两种战术同时还与华盛顿总战略之间形成了多方博弈。

史迪威坚信，美国“在亚洲大陆最终必将和日本佬作战”。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史迪威的这种观点“同华盛顿无须在亚洲大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打败日本战略是完全对立的”。马计划实施后，马歇尔一再提醒，“史迪威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些新的轰炸机基地”，而这些“新的轰炸机机场”均为马计划修建。所以在马计划实施期间，史迪威的任务就是配合华盛顿直接指挥的二十航空队执行马特霍恩计划。

陈纳德虽与史迪威积怨颇深，但两人同样固执地认为，要取得对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大陆免不了有一场美中合作的对日大决战。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认为这场大战将主要依靠空中力量，而不是靠史迪威主张的改革中国陆军部队来实现。极度自信的陈纳德声称，只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他就可以打败日本。1944年1月26日，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曾专门针对马特霍恩计划宣扬他“空袭理论”的可行性，并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就只剩马特霍恩计划了。”此话表明，陈纳德所认定的战争结束方式与华盛顿相去甚远，更显示出马计划在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马特霍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对各方影响既广且深，其直接原因在于华盛顿赋予了马计划“在人力、物力方面仅次于曼哈顿计划(was given top priority in both men and materials, second only to the secret Manhattan Project)”的绝对优先地位。然马计划拥有的这种优先性与其预期和实际效果都极不相称，颇为不合美国人的经济学逻辑：投入巨大的政治、经济“成本”，却没有一个好的“收益”。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高层为何对马计划情有独

钟? 如果马计划确实没有良好“收益”, 美国还会“不计成本”地实施吗?

马特霍恩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之间的密切关系, 或可解释马特霍恩计划为何“不合逻辑”地拥有最高优先权的原因: 马特霍恩计划是美国在二战期间投入费用比曼哈顿计划(约 20 多亿美元)还多, 高达 30 亿美元的“B-29 工程”的重要环节, 而“B-29 工程”不仅与美国全球战略密切相关, 而且涉及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运投武器的特殊使命。

二战后期, 美国抢在战争结束之前将原子弹用于实战, 目的不仅在取得当时常规战争的胜利, 更在于战后核控制权的掌握。这一动机促使美国在加紧原子弹研制的同时, 亦将原子弹的投放武器 B-29 远程轰炸机绑上了飞驰的战车。为尽快研制出成熟的原子弹投弹机 B-29, 美国本土上演了一场紧张的“堪萨斯战役”(the battle of Kansas), 其激烈程度并不稍逊于前线。

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推进, 刚下线的 B-29 尚未试飞就投入了战场, 参与执行从中国到日本本土袭击的马特霍恩计划。马特霍恩计划因此不再只是常规战术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而几乎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地试飞行动, 其紧迫性和曼哈顿计划一样需分秒必争, 其作战“效果”自然也不能再用传统战争的标准来衡量。马计划作为原子弹投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美国志在必得的核战略中获得顶级优先权也就不足为怪了。

战争时期, 将诸如 B-29 等不完全成熟的武器投入实战进行试验, 在一些军事战略家们看来是极合逻辑的“常理”, 无需大惊小怪。^① 本书之所以仍对此加以深究, 并非是想努力“还原”到当时那种对未来尚且无知的“历史环境”中去, 或自立一个并不存在的“命题”, 以便自问自答, 而是因为这种

^① 二战期间普遍存在将技术并不成熟、可靠性不高的武器投入战场, 在实战中边制造、边使用、边改造的“三边工程”的情况(此点承西南交通大学马志韬先生指教)。美国海军 F4U 战斗机, 1942 年就已经投入使用, 并被判定为“不适合在航母上使用”, 只能进入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服役(同时卖给英国皇家海军使用), 但仍旧一边广泛参战一边改进, 直至 1944 年达到海军标准才获准在航母上使用, 并服役至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北美飞机制造公司应英国所求于 1940 年, 仅花 120 天就推出的 P-51 战斗机, 因发动机性能不佳, 一度被主要用作俯冲轰炸机, 后经改进换装英制默林发动机以后性能大幅提高, 从欧洲战场到亚洲战场都有其活跃身影, 被誉为“歼击机之王”。类似地, 德国虎式、黑豹坦克都在技术很不成熟时就大量投入战场, 以至于因为发动机和行走装置可靠性问题而造成大量非战斗损耗。在空间距离巨大的太平洋战场, 即使较为成熟的机型如 B-17、B-24 等, 因为机械故障和导航问题而损失的比例也相当高(尤其是导航, 当时因为无线电导航技术条件所限, 长程轰炸机因为导航失误而失事、失踪的情况非常普遍), 由此而来的损失也在各国政府的意料之中。确实, 这种可以预见的高损耗在政府最高决策层中不以为奇, 但对其他当事人、观史者、史家而言却有些不寻常, 以致影响了对这些事件的基本认识。

“常理”的非常规性，往往在追求“真实”的归纳思维中被“历史地”忽略了。

回顾历史过程的同时，观察马特霍恩计划这一具有实验性质的特殊历史事件对同时期其他事件的影响显然是必要的，同时，马计划对中国战场上国共两党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关注。

目 录

序	陈廷湘	1
引言		1
第一章 马特霍恩计划的形成		1
第一节 美国方面的政策缘起		1
马计划的历史背景及相关研究		1
中美两国早期相关轰炸构想		7
第二节 阿诺德重庆之行:马计划的最初侧面交涉		13
一次自说自话的会谈		13
不露声色的战略意图		16
第三节 华莱士副总统访华:解决了马计划的情报和搜救问题		22
各方猜度中华莱士到访中国		22
马计划情报机构美军观察组的最初期成因		33
第二章 马特霍恩计划的配套行动		39
第一节 飞行基地的建立		39
B-29 飞行基地的选址		39
川西“B-29 特种工程”		45
B-29 机场的分布与使用		48
B-29 进入中国的航线		51
第二节 马计划的基本后勤保障		54
燃料等战略物资的运输		54
甘肃玉门油田对马计划的特殊贡献		57

医疗及“空—地救援”组织	61
第三节 美军观察组与马计划	66
观察组到延安	66
观察组对马计划的气象情报支持	71
观察组的撤离及其组织背景	80
第三章 马特霍恩计划的实施	88
第一节 马计划指挥系统	88
所谓“B-29 指挥权问题”	88
B-29 航空队的垂直指挥体系	93
第二节 马计划重要战役	99
“糟糕的开局”	99
6·15 八幡之战：“全球空战的开端”	102
汉口战役：火攻战术的成功演绎	105
第三节 马计划的战术分析	111
B-29 行动的目标选择	111
从“昼间高空精确轰炸”到原子弹投放	117
“夜间低空饱和轰炸”与“昼间高空精确轰炸”的冲突	120
第四章 马特霍恩计划的影响及历史地位	124
第一节 在华美军对马计划的反应	124
“一名战士”：马计划及所谓“史迪威事件”	124
“战斗机驾驶员”陈纳德与马计划	126
注定夭折的“华北登陆计划”	133
第二节 马计划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148
国共等方面对美军观察组的认识与期望	148
B-29 川西机场款案与 10 亿美元贷款案	155
漫长的谈判	166
第三节 马计划的优先权及其在现代国际战略中的地位	172
佯谬背后的顶级优先权	172
马计划、曼哈顿计划与 B-29 工程	179

从马计划到“全球到达—全球控制”	204
结语	210
缩写字母含义	217
参考文献	218
附录 1 1943 年 5 月 5 日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的《全球形势 报告(1943—1944)》	233
附录 2 1944 年 1 月 26 日陈纳德写给罗斯福的信	250
附录 3 1944 年 3 月 15 日罗斯福给陈纳德的回复	256
附录 4 1944 年 3 月 30 日美国陆军航空队参谋长汉塞尔将军 签署“同意”意见的 B-29 航空队指挥系统方框图	258
附录 5 1939 年 8 月爱因斯坦关于原子弹制造和投放问题 致罗斯福函	259
后记	261

图表目录

1944 年 3 月中国形势图	21
1944 年四川特种工程征工人数统计表	47
特种工程主要机场领得地价款(单位:万元)	48
成都附近美军机场示意图	49
B-29 战略轰炸机以中国成都和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的对日轰炸 范围示意图(1944 年 6 月—1945 年 8 月)	50
魁北克会议决定修建的输油管道(1945 年 4 月—1945 年 11 月) 及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示意图	50
阿诺德向罗斯福推荐的三条进入中国的航空通道中 A、B 线路	52
阿诺德向罗斯福推荐的第三条航空通道 C 线路	52
美国陆军航空兵第二十航空队 20 轰炸司令部实际进入中国的 飞行航线	53

国民政府军委会战地服务团(War Area Service Corp)为驻川

第 58 轰炸联队提供招待所概况表	65
战地服务团为陈纳德驻川战斗机群提供招待所概况表	66
美军观察组历届指挥官概况表	79
B-29 航空队指挥系统方框图	94
二战期间美国陆军航空队与其他机构关系方框图	95
马特霍恩计划历次任务概况表	112
马特霍恩计划轰炸目标及出击频次概况	113
1944 年 1 月川西 B-29 特种工程各机场民工达到和开工日期表	165
1943—1944 年成都主要市场平均米价表(单位:元/石)	171
1944 年驼峰航线货运量概况表(单位:万吨)	174
1944 年 20 轰炸司令部(XX BC)驼峰航运物资分配详情表	175
第 58 轰炸联队 B-29 损失情况表	186
日本统计的 B-29 对日出击表	197
阿诺德 1943 年离开中国后返回美国的路线	208